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七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編

巴蜀書社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七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編

巴蜀書社

1998年·成都

責任編輯：黃雲生

封面設計：文 瀾

責任校對：任 珍

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三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850×1168mm 32 開本 10.375 印張 25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700 冊

ISBN7-80523-881-2/I·369

定價：24.00 圓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七輯)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智勇	李文澤	祝尚書	郭 齊
郭聲波	舒大剛	曾棗莊	劉 琳

執行主編：王智勇

目 錄

論宋代文化研究的戰略發展

——關於宋代文化史料的資料化問題	郭 齊 (1)
蘇詩舊注補正 (三)	馬德富 (15)
宋刻本《四家四六》考	楊世文 (28)
池澤滋子《丁謂研究》序	曾象莊 (35)
論鶴相丁謂的政治功過	池澤滋子 (43)
宋朝官方宗教機構考述 (上)	郭聲波 (61)
論宋代的宮觀官制	劉文剛 (78)
固始遷閩考	劉 琳 (93)
試論《輿地紀勝》一書在編纂方法上的特點	李勇先 (99)
尹洙年譜	祝尚書 (110)
呂陶年譜	王智勇 (139)
三蘇後代補考	舒大剛 (168)
南宋后妃繫年	黃錦君 (170)
宋人傳記補遺——李心傳	約翰 C·查斐著 王 華譯 (199)
何爲象帝——從邵雍看老子注	華淵 (206)

宋太祖時期宋遼關係的變化	王曉波 (222)
遼宋文化交流與契丹文明的發展	李文澤 (238)
南宋淳熙二年成都府路戶口數辨證	王小紅 (250)
淺論元代四川地區的屯田及其意義	周 艷 (256)
1995 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簡述	郭 齊 (263)
1995 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	王蓉貴編 (272)

補 白

中華書局本《宋史》禮志標點正誤舉隅 (一)	(42)
中華書局本《宋史》禮志標點正誤舉隅 (二)	(60)
中華書局本《宋史·吳玠吳玠傳》正誤二則	(109)
中華書局本《宋史》禮志標點正誤舉隅 (三)	(167)
編纂短訊	(169)
《諸子集成補編》出版	(205)
《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出版	(221)
《諸子集成續編》出版	(237)
《諸子集成新編》出版	(261)
《張栻全集》出版	(271)
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管理系統 2.0 版出版	(327)

論宋代文化研究的戰略發展

——關於宋代文化史料的資料化問題

郭 齊

—

宋代文化研究，就其內容來講，不外乎重建宋代文化的史實以及給予這些史實以合理的解釋兩個方面，或者說述史和立論兩個方面。不論是重建或解釋，述史或立論，都是研究者對宋代文化的認識活動，都必須遵循人類的認識規律。

我們知道，人類認識事物的唯一途徑，是接觸認識對象本身。在反復接觸過程中，事物的顏色、形狀、氣味、聲音等現象通過人們的感官反映到大腦中來，經過大腦的能動思維活動，就得出了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感覺的材料越豐富，越詳盡，對事物的認識就越深刻，越全面；反之，感覺的材料不豐富，不詳盡，對事物的認識就可能是片面的、表面的。如沒有視覺感知材料就缺乏對顏色的認識，沒有聽覺感知材料就不了解事物的聲音，等等。

宋代文化研究也是這樣，研究者只有通過與宋代文化的充分接觸和感知，才能認識它的本質規律。由於宋代文化已經成為歷史，研究者已不可能直接感知它，而主要是通過現存宋代史料（典籍和實物）間接地感知。這些史料記錄了宋代文化的種種現象，研究者在閱讀或考察它們時，就得到了對宋代文化的種種感

覺和印象，最後得到對其規律性的認識。因此，研究者對宋代文化史料的佔有情況，直接決定着他對宋代文化的感知程度，從而決定了他對宋代文化的認識水平。佔有的材料越豐富，越詳盡，對宋代文化的感知就越充分，對它的認識就越全面。反之，就會感知不深，認識不透。例如，要研究宋代文化的內容，它的產生和發展，它的特點，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它的傳播，與歷代文化的異同，與各國文化的比較等涉及內外規律的問題，自然應該佔有兩宋三百年間理學、宗教、文學、藝術、史學、科技等各個分支的全部資料。要研究宋代佛教，就必須掌握宋代佛教政策、制度、寺院、僧人、譯經、傳經、佛學與理學、文學的相互滲透等各個方面的情況。研究司馬光的史學，除《資治通鑑》、文集等本人著述外，還得擁有關於他的生平、交游、師承、後學、朝廷褒貶、社會評價等方面的所有材料。研究蘇頌對宋代科技的貢獻，只讀一本《新儀象法要》是遠遠不夠的；研究《清明上河圖》，當然也不能只玩味這幅作品本身。總之，從總體研究到局部研究，都必須詳盡地佔有材料。顯然，最理想、最科學的辦法，莫過於進行窮盡的研究，即將與研究專題有關的材料一條不漏地掌握在手中。一有遺漏，就難免以偏概全，甚至以假為真。可以說，材料是否有所遺漏，是與研究的成敗優劣生死攸關的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無所遺漏呢？我們來看看宋代典籍記錄宋代文化現象的情況。

經部的典籍主要反映宋代經學和語言文字學的情況，史部主要反映宋代史學的情況，子部主要記錄儒、兵、農、工藝、醫、曆算、術數、藝術、雜學、典故、小說、道教、佛教各家的學說，集部主要匯集詩、文、詞、曲等作品。但各類典籍除主要反映某一方面的情况外，還同時具有包羅萬象的內容。如經部典籍就反映了宋代理學、邏輯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政治、法

律、軍事、經濟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各個方面的情况。同樣，某一種典籍也可能是包羅萬象的，如朱熹的文集，除集中體現了他的理學、經學、政治、倫理思想、宗教及文學觀、語言觀、生平事迹外，還有關於宋代史學、社會風俗、宋代報紙、書法、繪畫、音樂、文獻、裁剪縫紉、建築、宋代度量衡、數學、醫學、天文學、農藝等方面的大量記載。反過來講，宋代文化某一方面的材料，可能散見于經、史、子、集群書之中。而究竟見于哪一類、哪一種或幾種書，由于宋代典籍浩如烟海，因而是無法測知的。某一方面的材料，我們可以根據翻檢過的書籍肯定有，卻無法根據沒有翻檢過的書籍斷定無。古人之所以講究“過眼”、“經眼”，道理就在這裏。例如，關於宋代教育，可能從經部中發現宋儒豐富的教育思想，可能從史部中了解到宋代教育政策和制度，也可能從子部找到宋人的教學方法，從集部獲得宋代教育的大量史實。宏觀研究如此，微觀研究也是這樣。例如，關於某一文化名人的生平、思想，有誰能斷定哪些書有資料，哪些書沒有資料呢？很明顯，宋代典籍記錄宋代文化，不是像現代科學那樣分門別類地去記錄哲學、文學、史學、藝術……等等，而是混雜交錯，散見各處，沒有規律可循的。這樣，要做到詳盡佔有，一條不漏，除非遍檢現存四千六百餘種宋代典籍，像翦伯贊先生所說的那樣，“一本一本書從頭到尾一字不放松地去搜查”。不如此不可謂詳盡，而只能是史料學要、舉例或史料抽查、選查，難保沒有遺漏。

當然，不是說研究任何問題這四千六百種典籍都與之有關，其中可能大多數或絕大多數是和該選題無關的。但結論應產生于調查研究之後，不遍檢群書，怎麼知道哪些有關，哪些無關呢？能夠有把握地排除在外的（如根據史料的確切年代等）畢竟只是一部分，而許多看似無關的典籍，也許其中就埋藏着極為珍貴的資料。凭經驗劃定的選材範圍和通讀書目，猜測成分頗多，有很

大的隨意性。

各種史料的價值自然也是不同的，有真有假，有粗有精，有主有次，有直接間接，有集中與分散，有重要與不重要。但有比較才能有鑒別，詳盡佔有才談得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要做到取捨有據，剪裁得當，還得要遍檢群書。

科學研究當然不只是機械地排比歸納材料，也需要懂得個別和一般的原理，要運用演繹的方法，抽象的方法，邏輯的方法。不僅要注重嚴密，也要講求經濟和輕靈，可以舉一反三，甚至假想也有它的價值。問題在於不詳盡地佔有材料，怎么能保證所學之“一”是“反三”之“一”呢？何況選題的性質各有不同，對史料的要求也不盡相同，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舉例來說明的。恐怕更多的還是需要在詳盡佔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定量分析，舉例是很難有說服力的。

總之，宋代文化研究認識活動的性質要求我們詳盡地佔有材料，進行窮盡的研究；宋代史料混雜和分散的特點，則迫使我們面對全部現存四千六百種宋代典籍及各種實物，而不是其中的某些部分。

過去的宋代文化研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無一例外地採用了史料舉要或舉例的方法。研究者不是以全部宋代史料為背景，而是選取其中的極小部分，作為分析的對象，從中引出研究結論。這就使研究工作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有的重大問題完全依賴於材料的偶然發現而得到解決；有的由於資料不足，至今懸而不決；有的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有的各執一端，言人人殊。例如：

柳永生前地位卑微，《宋史》無傳。宋人筆記中雖有一些零星記載，但多出於傳聞，其說不一，時有訛誤。因此，過去對柳永的家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只是五十年代末，高熙、唐圭璋等人先後據地方史乘，考證出柳永的祖父柳崇為五代末處士，入

宋，贈工部侍郎。柳崇長子柳宜，仕至工部侍郎。柳永就是他的第三個兒子。1982年，葉嘉瑩發現了王禹偁《小畜集》中的材料，擴大了高、唐的研究成果。她考證出柳氏原籍河東，柳崇五世祖柳奧隨叔父柳冕到福州任司馬，改建州長史，于是在那裏定居。五代時，柳崇隱居于崇安五夫里的金鵝峰下。柳宜在南唐時就以布衣上疏，言時政得失，被李國主器重。1986年，李思永再次從《小畜集》中找到有關材料，進一步考證出柳宜的官歷：南唐時，任太子校書郎—江寧尉—貴溪令—崇仁令—建陽令—監察御史，入宋，任費縣令—雷澤令—任城令—著作佐郎，全州通判—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工部侍郎。至此，學術界對於柳永家世的認識，才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從柳永家世的研究過程中可以看出，研究者最初遺漏了《小畜集》這樣的史料，後來注意到了，也沒能遍檢，以至有關重要史實以後才陸續得到補充。

自從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畢昇發明用膠泥作活字印刷後，大多數人對此深信不疑。但多年來，國內外持懷疑態度的也不乏其人。一些論者連續撰文，指出活字印刷不可能是畢昇發明的。臺灣學者黃寬重從周必大的《文忠集》中發現了有力的佐證，從而再次確認了畢昇的發明權，具有重大的意義。

膾炙人口的《滿江紅》詞（怒髮冲冠），到底是不是岳飛所作？近代余嘉錫首先提出質疑，認為可能是明人僞托。六十年代初，夏承燾支持余嘉錫的觀點，并補充了新的材料，進一步加以發揮。他們的觀點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此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反對僞托說的主要有唐圭璋、鄧廣銘及臺灣的李安等人。質疑派和肯定派各自都進行了大量的考證，從各個方面進行辯論。但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學術界只好寄希望于“借助史料的佐證，得出翔實的結論”。1986年，佐證終於找到了。李莊臨、毛永國在《須江郎峰祝氏族譜》的《詩詞歌賦》集中發現

了岳飛于紹興三年贈祝允哲的《滿江紅·與祝允哲述懷》，這就是今天流傳的《滿江紅》詞的藍本。至此，爭論多年的問題才算有了圓滿的結果。

關於辛棄疾的生平，有關專著已達三十餘種，研究不可謂不多，基礎不可謂不好。然而這位大詞人在江陰策判任滿到通判建康府之間，竟然“消失”了整整三年。這期間的行踪，至今仍無着落。要解開這一千年之謎，僅局限于原來的史料範圍顯然是無能為力了。

李清照是否曾經改嫁？從宋代一直爭論到今天。五十年代以來，力主改嫁說的有黃盛璋、王仲聞、王延梯等人，為李清照辨誣的則有唐圭璋、潘君昭、黃墨谷、劉憶萱等。主張改嫁者以李清照所作《投內翰綦公崇禮啓》作為鐵證，辨誣者稱《金石錄後序》方為可靠依據。這個問題的爭論，如不開拓新的史料，將永無定論。

七十年代末以來，學術界對朱熹的思想進行了再評價。其中，有的學者宣稱，朱熹對王安石變法是同情的。但我們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看到朱熹對王安石及其新法這樣的評價：“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于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于後”，“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于橫流而不可救。”“所以施于政者，……乖事理，拂民情”，“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于如此”，“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青苗法）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這樣的史料，研

究者怎麼能置于不顧，而得出朱熹同情王安石變法的結論呢？

蘇軾是宋代文學中研究最多的作家，僅分析《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的專論就達一百多篇，可見研究規模之一斑。但其中真正有分量的論著到底有多少呢？隨處可見的卻是淺嘗輒止，滿足于浮光掠影的觀察和一麟半爪的描述。究其原因，就在于沒有系統而全面地掌握有關材料，對作家缺乏深入的了解。難怪有的學者深有感觸地浩嘆：“研究蘇軾的人何其多，通讀蘇軾的人何其少啊！”

再看宋詩。關於宋詩的特點，有“以文字、議論、才學爲詩”、“以文爲詩、愛國詩、詩中有畫”、“現實性、哲理性、奇趣性、通俗性、入畫性”、“強烈的時代精神、愛國精神和平淡自然的風格”、“散文化、多議論、語言通俗化”、“書卷氣、理趣、以意取勝”等各種說法；關於宋詩的代表人物，有蘇軾爲代表，黃庭堅爲代表，包括“蘇、黃、陳”的元祐體爲代表等各種看法，各執己見，莫衷一是。這中間固然存在着學術觀點的不同，但也不能不說是研究材料狹窄，對宋詩把握不完全，體會不深入所致。無怪乎有的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的宋詩研究是“盲人摸象”。

從宋代文學的宏觀研究來看，迄今爲止，研究過的作家不過一百多人，而現存宋人別集就有七百多種，宋詞作者一千三百餘人，宋詩作者八千六百多人，宋文作者近萬。所謂研究過的百餘家，真正認識比較深的不過十餘家，接觸多一點的也不過二三十家。像程俱的《北山小集》、衛宗武的《秋聲集》、仲并的《浮山集》、衛博的《定庵類稿》、傅察的《忠肅集》、朱長文的《樂圃餘稿》、朱松的《韋齋集》等，都有其鮮明獨特的風格，有豐富的詩學、文論等多方面的資料，可惜幾乎從來無人問津。可以斷言，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遠不足以概括宋代文學的全貌。

以上事實充分暴露了史料舉例在方法論上的缺陷。假如《小畜集》、《文忠集》、《須江郎峰祝氏族譜》等史料不被排除在視野之外，我們當初就不會對柳永的家世一無所知，畢昇的發明權就不會受到動搖，《滿江紅》詞的真偽，也不會爭論達幾十年之久了。正是由于研究者佔有的材料有限，對宋代文化現象的感知是片面的、表面的，有時甚至只接觸到假象，這樣，其結論的可靠性和普遍性自然就成了問題。有的不過是幸而言中，有的只是面目相近，有的甚至似是而非。這就是各種論著中充斥着大量的“初探”、“淺析”、“略論”、“概說”、“試評”、“簡述”、“芻議”之類的根本原因所在。冠以“初”、“淺”、“略”等字眼，固然是出于謹慎，但其中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恐怕實在是自己也沒有把握。

現代社會科學日趨精密，我們今天怎麼能滿足于在“初”、“淺”、“略”、“簡”、“概”的水平上徘徊？不能總是依賴遙遙無期的偶然發現，而應該有所作為。時代的發展和研究要深入的需求賦予了我們擯棄史料舉例，走向窮盡研究的任務。

二

然而，沒有人能通讀全部宋代史料。要求窮盡和無法窮盡的矛盾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認為，出路就在于宋代文化史料的資料化。

所謂資料化，就是利用計算機等現代科學手段，將現存宋代史料重新進行切分、組合，把因散見群書而無法利用的史料變為集中而可以利用的資料，把因篇帙浩繁而無法搜尋的史料變為檢索方便，唾手即得的資料。

前人在這方面已經作過諸多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果。歷代編纂的類書，就是將古書中的材料分門別類地加以輯錄，客觀上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如《玉海》、《永樂大典》、《經濟類編》、《古

今圖書集成》可供研究宋代各類事物，《淵鑒類函》可供研究宋代詩文，《喻林》中匯集了大量修辭學資料，《全芳備祖》則專收花草樹木方面的材料，等等。正在編纂的《中華大典》，預計收入現存古籍兩萬種左右，總字數達七億，下分哲學、宗教、經濟、文學、藝術、歷史、醫學等二十一典，九十二個分典，典、分典之下設總部、部。全書構思宏偉，規模空前，將成為我國類書的集大成者，古代典籍的資料性總結。

各種關於宋代的索引，也是宋代史料資料化的成果。如果沒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宋史人名索引》等，我們在研究宋人事迹方面將會措手無策。可惜這方面的工具書尚屬鳳毛麟角，面對汗牛充棟的宋代史料，仍有捉襟見肘之虞。1991年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上¹，有學者提出仿日本學術界唐代研究之例，編纂宋代研究系列索引，包括時間、人物、事件等各個方面。這一建議無疑是有價值的。

專題資料匯編在更大的程度上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如《李清照資料匯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的宋代部分等。《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等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史料指南的作用。

國外學者在宋代史料資料化方面，也付出了艱苦的勞動。法國的巴拉茲在實施他的包羅萬象的宋代研究計劃——宋計劃時，首先就是從資料建設入手的。他在1954年9月25日發出的第一份通知中明確指出，要想為多卷本的《宋史》提供一部現代的、科學的綜錄，就必須要有充分滿足西方人需要的工具書。具體說來，首先要完成三個相對獨立的部分。第一部分為宋代研究參考資料，第二部分為宋人傳記辭典，包括兩千個左右的條目，第三部分設置了一份按書名字母順序排列的宋人著作提要，包括對宋代全部重要書籍簡明而全面的評介。每種書籍之下注明標題的轉

寫和翻譯，作者姓名、朝代、生卒年、著作問世年代、卷數、內容、版本，以及漢文文獻的準確參考書目。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巴拉茲的計劃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宋人著作提要具有史料指南的作用。這一部分已由赫沃特于 1978 年最後編成出版，定名《宋代書錄》。評論者稱它“為研究者提供了任何現存歷史詞典和《四庫提要》都沒有的資料”。書中還附有主題索引，為讀者迅速提供利用資料的簡明線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日本學者也歷來重視“資料先行”。例如，關於朱熹，就已編纂了《朱子四書集注索引》、《朱子四書或問索引》、《詩集傳事類索引》、《朱子語類 1—13 卷語句索引》、《朱子語類人名地名書名索引》、《朱子文集固有名辭索引》、《朱熹文集人名索引》等工具書。1973 年出版的《朱子語類大全》，囊括了《朱子語類》研究的所有有關資料。1974 年開始出版的大型叢書《朱子學大系》，匯集大量極有價值的資料于一編，以至西方學者研究朱熹大多依靠日本的資料，反而不大注重國內的原始材料了。其他關於宋代的工具書尚有《二程遺書、外書、粹言索引》、宋版《明公書判清明集》、《宋名臣言行錄》的現代漢語譯注本、《宋人傳記索引》、《續資治通鑑長編人名索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人名索引》、《宋會要研究備要——目錄》、《宋會要輯稿·食貨》的人名、書名、年月日、詔敕等索引、《日本現存宋人文集目錄》、《宋代文集索引》、《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語匯索引》等數十種。在宋代史料搜集整理方面，日本學者已走在我們之前。

所有這些中外學者的努力，都為將宋代文化史料資料化，從而服務於研究工作，提高研究水平作出了貢獻。然而，前人所作的工作，又都是局部的，零碎的，缺乏系統性，離宋代文化史料全面資料化的目標，還有極為遙遠的距離。已經出版的工具書，其史料覆蓋面仍然是十分狹窄的。王德毅的《宋人傳記資料索

引》，引用書目僅五百餘種，赫沃特的《宋代書錄》，也只有六百六十多條。因此，從本質上講，它們仍然屬於史料舉例的範圍，仍難避免以偏概全，甚至挂一漏萬的弊病。而宋代文化史料資料化的目標，是要編製出能覆蓋所有現存宋代史料的指南。

具體說來，可以分為三個步驟或三個方面，即普查、整理、資料化。

第一步，應組織人力徹底弄清現存宋代史料的情況。普查的成果為：1.《現存宋人著述總錄》，這一部分已經完成并出書。2.《宋以後所存宋人著述總錄》（或匯編），專錄《現存宋人著述總目》以外的，僅見于元、明以來文獻中的宋人著述。這一部分的普查工作可以和元明、清史料普查結合進行。3.《現存宋代實物總目》。以上各書均應注明版本和收藏情況。新發現和新出土的宋代著述和實物，應陸續編入。

第二步，對普查所得宋代史料進行全面整理。對現存實物，應逐一進行鑒定、複製、攝影等。對宋代典籍，應逐種進行考辨、影印、縮微、校勘、標點、注釋、翻譯、輯佚、匯編等工作，其成果是高質量的整理本。這裏應當說明，每種典籍如何整理，應視情況而定。如考辨、校勘大約是必須進行的，而大多數典籍不必注釋、翻譯，標點也可作可不作。總之，經整理後的史料，一要可靠，二要使用方便。

第三步，組織具有相當研究水平的學者，利用計算機等現代科學手段，編製《宋代文化史料指南叢書》。這項工作的性質是利用集體力量，通讀現存全部宋代典籍，按照現代科學分類，將群書中的史料重新分割，分別載入檢索系統，實現史料資料化，建立宋代文化研究資料庫。具體作法是，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員，視其能力，每人承擔一種或數種宋代典籍，一字不漏地通讀全書，並將宋人所作原文按史料的類別逐條編入索引。每個條目下依次注明史料類別、書名、卷頁，索引前言說明所據版本及館